

2-3-23

实施经济文化一体化战略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

高 波

经济文化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对于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来说，应抢抓机遇，把握趋势，积极谋划，促进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重要途径。

经济文化一体化这一宏观发展趋势的深层次动因，一是知识经济促成经济文化一体化。作为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文化新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是“燃料”，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先导。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受制于物质、能量、资源的有限性，而知识经济发展则得益于知识、信息创造价值的无限性。随着产品制造模式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以及知识型企业的大批涌现、崛起，知识资本逐渐构成超越土地、货币等要素资本的“第一资本”，知识成为发展之源，“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其本身的含义。在走向知识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知识、智力、信息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包含信息文化、科技文化在内的文化正不断扩充地盘，强力向经济渗透；而经济也在不断地走向文化，并借助于文化来发展自身，经济已不仅仅扮演文化发展基础的角色，而且也成为文化的一种创造方式，经济“搭台”让文化“唱戏”，从而汇成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潮流。二是市场经济需要经济文化一体化。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更是一种高文化含量的经济。如果说经济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那么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文化在影响着经济。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如生产、流通以及决策、管理等，都或多或少地蕴含着各种文化因素，其不同功能的形成、发挥无不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因之上。文化广泛渗透、弥漫于整个经济领域，既表现为动力、资源，又构成经济运作的“润滑剂”。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文化一体化同样构成了当今市场经济的重要走向。三是新的发展观呼唤经济文化一体化。自 20 世纪 40 年代至今，经济社会发展观的演进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以单一 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标准的“单一增长观”（工业文明观），不考虑文化因素；衡量标准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指标的“增长极限论”，开始注意文化；“持续发展观”，主张经济 + 社会 = 发展，开始接纳文化；“综合社会观”，主张社会 + 人 = 发展，开始高度重视文化作用；“以人为中心发展观”，主张社会发展与其伴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这是涵纳文化并以此为重心的、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新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属于这种发展观。新的发展观强调从以工业化目标的“增长第一”（甚至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以 GNP 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转到提倡全社会的协调发展；从以器物工具为中心的发展，包括在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关系上只重视货币资本，在商品价值与人的价值关系上只重视商品价值，在发展内涵上只重视经济物的发展，转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以不惜破坏资源、生态为代价，追求经济一时繁荣，转到可持续发展。新的发展观明确认定“增长”（growth）与“发展”（development）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提出经济增长≠发展，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只有全面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

展，发展 = 经济 + 社会 + 人。经济文化一体化正是这种发展观的生动体现和客观要求。

贵州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自然、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与发达省市比较仍有较大差距。在此基础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是客观要求。

如前所述，经济文化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新的理念、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发展策略、新的发展模式。崭新的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模式为贵州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一趋势，大力促进贵州经济文化一体化，着力培育文化力，提升经济力，使贵州早日实现周总理期待的“后来居上”的宏愿。

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原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后来者能够具有先行者所不具有的后发优势。一是后发者可以借鉴先行者的成功经验，从而避免走弯路。二是后发者可以吸收和引进先行者的技术开发成果，实现技术的跳跃式进步。三是后发者对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可以依靠信息技术的渗透，形成新的生产优势。四是后发者具有强烈的赶超意识和欲望，能够激发各类群体共同奋斗，形成持久的赶超态势。贵州这样落后地区具备如此后发优势，只要我们善于把握机遇，找准切入点，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先进省区的目标。

解放以来，贵州各族人民艰苦创业，经过 20 世纪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特别是 60 年代的“三线”建设，资源开发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日益增长，经济实力逐渐增强。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贵州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为实施经济文化一体化战略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贵州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贵州传统文化主要由夜郎文化与移民文化两部分构成。夜郎文化是贵州最古老也最有影响的本土文化，具有双重边缘性、既开放又封闭的二重性、神秘性。移民文化具有开放、兼容，富于创造性的特点。贵州传统文化多元一体所特有的开放、兼容精神，淳朴、守信的道德观念，以乡规民约等习惯法维护社会秩序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富有创造性、敢为天下先等等，与现代性观念都十分接近。贵州传统文化中的自我管理能力，古朴、淳厚的民情乡风，保存较为完好的民族文化生态等等，也为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稳定系统和文化生态环境。贵州传统文化能为现代化提供相应的资源，即贵州传统文化首先是现代化的根源，是一种依据。富民兴黔是贵州各族人民内在的要求，也是现代化与贵州传统文化的连通点，所以追求并走向现代化能够成为贵州人的自觉行动。同时，夜郎文化及各少数民族文化还成为当代社会中十分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此外，贵州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蕴含了丰富的“红色文化”，为兴黔富民事业提供了精神支撑。总之，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条件，为贵州实施经济文化一体化战略创造了文化前提。

发展文化产业是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内在要求，贵州发展文化产业，要大力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优势产品，打造优势企业，形成优势产业，开拓文化市场。

要用现代生态文化改造传统农业。目前正在世界兴起的生态革命，是一场技术、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深刻革命，它正在使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工业经济转向生态经济，人类社会也由工业社会走向生态社会。生态化发展模式是对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辩证否定，它扬弃了只注重经济效益而不顾人类福利和生态后果的唯经济发展模式，转向兼顾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注重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整体效益。城乡生态化就是要遵循整体优先和生态优先的原则，实现城乡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的演进过程，不仅涉及城乡物质环境的生态建设、生态恢复和生态重构，更涉及价值观、发展观、生活方式、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贵州是一个耕地资源相对短缺的山区农业省份，必须以新的生态视角开辟一条非传统式又非西方化的农业生态化发展之路，实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经济的文化化，提高农业增长的内在品质。其要点是，突出比较优势，以较低成本采用新技术成果发展现代农业；把产业化经营作为市场农业的基本经营方式，把农业发展成为产供销一体化、种养加一条龙式的现代农业；把资源型为主的农业转变为科技型为主的农业；实行劳动密集型技术路线，大力开发人力资本。

要用现代企业文化进一步武装工业。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要进一步推动工业的发展，就要借助于现代企业文化。文化力能给企业带来有形和无形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双重效益，是一种象征企业灵魂的价值导向，反映了一种从事物质生产的精神气质、一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献身事业的生活态度，是企业发展的深层动力。用现代企业文化进一步武装工业，一是要用现代企业文化完善企业精神。二是要提高工业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升产品的文化竞争力。三是要建立企业家与市场双向选择的市場空间和文化氛围。四是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培养，着力提高人口素质。用现代企业文化武装贵州工业，首先必须用现代先进文化武装人，不断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转变落后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树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思想、价值观念，这是促进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根本。

要以旅游文化为龙头，进一步繁荣第三产业。旅游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之一。贵州旅游产品种类丰富，文物古迹、山水风光、民族风情，这些资源具有垄断性和丰富性，而且有相当的规模和基础。由于近年来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旅游的需求急剧上升。周末度假、节日度假等度假产品将有广阔市场，旅游业正在成为贵州新的支柱产业。按照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以旅游文化为龙头，繁荣和发展第三产业，是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重要途径。首先，要走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路子，发展贵州旅游业。其次，要大力发展现代会展业。第三，要顺应旅游文化的发展，加快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第四，实施一系列经济文化重点工程。经济文化力的凝聚、建构和产出，必须借助一定的经济文化载体。应根据贵州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资源条件，有重点地实施适应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需要的科技教育工程、人才工程、旅游文化工程、形象文化工程、绿色（生态）工程、节庆会展工程等。

谐社会所必需。目前我们有利的条件和不利条件都集中在一点上，即这一整套机制建立的路径在总体上只能“自上而下”。其有利的方面是，能够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有步骤地推进机制的建构，并在短时期内显示其成效。其不利的方面是，容易或以“长官意志”替代复杂的建构过程或把“长官意志”渗透到复杂的建构过程，从而最终使其流于形式。这就向党提出了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的要求。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建构有效制衡和分享公共权力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取决于党的执政方式和能力的创新。

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能够容纳人们理想和价值追求多元化的社会。和谐并非“抽象同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在这种矛盾和冲突能够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实践证明，压制矛盾和冲突，必须导致社会制度僵化。灵活的社会则通过矛盾和冲突而受益。利益关系多元化、社会阶层多元化以及资源占有多元化必然导致人的理想和价值追求多元化，人的理想和价值追求多元化则是利益关系多元化、社会阶层多元化以及资源占有多元化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民主和法制的范围内允许、鼓励、引导人的理想和价值多元追求，为具有不同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社会成员提供社会参与路径。只有这样，具有不同理想和价值追求的个体和群体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认同；从而也才有可能通过这种认同，创立新的规则和秩序，增强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把社会矛盾和冲突转化为使整个社会向上的巨大动力。在这方面，党应充分发挥其协调功能和监督功能。不过，党发挥这方面的作用，不能以党代政，而要党政分开。惟有如此，党的协调功能和监督功能才能得以发挥。如果以党代政，而且政府又“无所不包”，党的协调功能和监督功能也就随之丧失。因为协调者和监督者不能同时也是具体的政务工作的责任者。也不能把主流意识形态视为现实社会中惟一应存在的意识形态，应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理想和价值追求多元的有机统一。

动态上看，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系的特征说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体制改革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推进体制改革是统，这一系统朝最优化方向发展，取决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方式的转变。“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执政、政、依法执政”，充分发挥其引领、监督功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主导作用。种主导作用表明，全面推进中国体制改革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是产党自我革新的过程。（执笔：庞本康）系作者独立完成的社科研究成果《关于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系》的一部分）

问题的新路子

（作者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